

一个寂寞惯了的人

于千万人之中，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。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：“噢，你在这里吗？”

我们去找 张爱玲

西岭雪 著



尘埃落满， 寂寞花开

尘埃落满，寂寞花开

我们去找张爱玲

西岭雪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尘埃落满，寂寞花开：我们去找张爱玲 / 西岭雪著.
—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3.1

ISBN 978-7-214-09005-8

I. ①尘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289578号

书 名 尘埃落满，寂寞花开：我们去找张爱玲

著 者 西岭雪

责任编辑 朱晓莹

策划编辑 宋 甜

特约编辑 康晓硕

文字校对 陈晓丹

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46千字
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9005-8

定 价 36.00元

（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）

目 录

沉入历史的湖

忆大寨之游	韦君宜 (3)
丙午丁未纪事	
——乌云与金边	杨 绛 (8)
牛棚生活	季美林 (26)
一块土地	贾平凹 (35)
死之余响	赵丽宏 (41)
王府大街 64 号	雷 达 (46)
书 祭	舒 婷 (52)
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	梁 衡 (56)
忆眸子	陈白尘 (62)
被俘人员的信	老 姜 (68)
你，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	万伯翱 (71)
回看血泪相和流	柯 灵 (79)
谁说草木不通情	
——忆冠华	章含之 (86)
沉入历史的湖	马 风 (96)

小 看 客

八十自省	
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态	萧 乾 (103)
霞落燕园	宗 璞 (108)

晚翠园曲会	汪曾祺 (113)
人名历险记	蓝翎 (119)
美 丽	张贤亮 (122)
二〇〇八上课记	
——他们的困惑和我的困惑	王小妮 (141)
小看客	鲍尔吉·原野 (154)
寻觅回来的哀痛	唯明 (168)
痴 子	俞明 (173)
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	刘成章 (178)
一个小孩的心灵史	秦文君 (183)
二 马	刘亚洲 (188)
出自幽谷 迁于乔木	卞毓方 (192)
春日探寻聚源中学	陈丹燕 (201)
水巷桥畔	凤章 (206)
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	魏得胜 (211)
父亲的毒酒	赵晏彪 (213)
聂卫平与大竹之战	沈果孙 (218)

偏 锋

无名氏	柯灵 (227)
俺村、中国和欧洲	刘震云 (231)
新大寨行述	二月河 (235)
老舍着装的历史内涵与精神表征	徐德明 (238)
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	王开玲 (243)
匿名者	塞壬 (248)
思维的乐趣	王小波 (259)
中国人，你为什么生气	龙应台 (266)
王仁先	刘亚洲 (269)
告 诉	
——格致工作记录本	格致 (273)
煎饼花儿	马瑞芳 (281)
偏 锋	桑麻 (286)

切尔诺贝利：他依然没有撤离	苍 耳 (297)
命 案	朝 阳 (303)
申报教授	张国俊 (314)
走 路	林 希 (321)
丑陋的中国人	柏 杨 (326)
漂流者	孙 郁 (337)

沉入历史的湖

忆大寨之游

韦君宜

我去过五次大寨。

头一次接触大寨，是看刘德怀写的关于大寨的小说。头一章写的是陈永贵在灾荒年头如何去赶集卖馒头，别人多要钱，他还按过去的老价钱要。写得挺朴素。我觉得有可取之处。就答应到大寨去，谈谈稿子，了解了解情况。

这时候，全国学大寨的口号已经喊出来了。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学大寨运动的规模。到了昔阳县，进了大寨村，却只让我们在村子周围草率绕了一圈，没和一个农民谈成话。回到县里，见到了一个宣传部的干事，大约是个知识分子吧。天已经黑了，刚挑水回来，一身是汗。说：“现在县里正抗旱。”陈永贵提的：“没有见过的大旱，要没有见过的大干，来个没有见过的大变。”所以，全县干部工人，不管干什么的，一律得跟农民一起，下地挑水浇田，而这里水太珍贵，挑一担水，一般近的要十里，远的要二三十里。算二十里吧，挑一担水，来回数十里，能浇十棵小苗。这样全体动员，一个人一天浇二十棵，要走八十里。这庄稼，是没法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计算的呀，简直是用人命换来的！这回我没去多看，也不想多看，就走了。后来在县委招待所听别的客人说，要了解这里的事儿，只能找名记者宋莎荫，主意都是他出的。

第二次我又来取经，这回碰见了名人宋莎荫，他知道，我们是出版社来的。果然给了比较“优厚”的待遇。没有跟着参观大队进村，而由一位专门的讲解员陪同，走得也慢点。不过，我们所看到的也还是差不多。看了“先治坡，后治窝”，看了“苦人树，乐人树”，看了大寨展览馆。都是从报纸上找得到，背都背得下来的。

所以，后来那几次，我本来没有兴趣再去了。那是没法子，身负“任务”，不得不去。又屡次进村，屡次参观，听讲解。记得其中一次，参观了人造梯田，

四个农民连背带抬一块很大的石头，吭哧吭哧安在半坡地下，当然，这样的梯田很美观。可是，田地由这样的人工修成，我不禁又直感到四个人用一下午功夫安上四块石头，中国人的劳力真是比牛力马力还要低贱了！当然，他们这样苦干，对这种精神应当佩服。可是当又一次进村，参观到刚建成的“人工下雨”时，我可不能不当时就“哎哟”了一声了。这下雨的方法，原来是在一块田的周围，安装了若干根自来水管。好像公园里喷草地的水管一样，开关一开，管子喷出水雾。只是太小了，只有一亩地大小，如果中国的田地都用这种方法来下雨，那中国非首先工业化到钢铁厂比农田还要多才行。要不，哪里来这么多铁水管？

下午回到县城，已经不早了，我不想再去跟这里的县委宣传部打交道，就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人家也下班了，明天再说吧。”那位陪同的宣传部干事却说：“这你不知道，昔阳的规矩和全国各地都不一样，这里的一切机关都没有上下班时间。早晨睁眼上班，晚上上床下班。这是老陈说的，农民有什么上下班？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到机关都有人，不信你看看。”他的话倒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真在晚饭以后时间跑到县委宣传部去。果然灯火辉煌，虽然不是每张办公桌上有人办公，反正坐着几个。有正看报的，见我们过来，推开报纸就谈工作。不一会儿，还把宣传部长陈明珠（陈永贵的儿子）请了来和我见面。据他说，星期天也是这样，他们没有星期天。

这好不好？我不知道。也可能他们发动起了全体职工献身的积极性。但是，这些人还是人。要他们不管家务，一切推给老婆，也许可以。要他们不管孩子，不休息一会儿，不买东西不上街，甚至不换衣服不洗澡，这可就太难了。不得不使人做出坏推测：弄不好，天天都是星期天。

后来见到宋莎荫，他请我们吃饭。就在县委招待所里。里边有间小餐厅，平时我们进不去的，他随口叫菜，随便叫人，一看就知道了这是真正的主人。然后他把县里准备培养的几个青年作者向我们介绍，他们不但要自己建设大寨，还要自己写大寨。这几位未来的作家每人分配了一个题目，文章还没有一个字，就这么跟编辑联系上了。

以后，大寨就成了我们编辑部大家常去的地方。我也又去过。并没看到太多新东西。却是人越来越多，排场越来越大。我记得又一次去时，看见穿藏族服装、傣族服装的……真是全国东西南北的人，无不来此瞻仰，来听讲解员那无数次的重复。我们也又看见一点新建设，即“人造平原”，把上回刚修好的梯田，又推平了，让它“平”的面积稍大一点。

宋莎荫也再次和我见面。这次显得熟多了。跟我闲谈，谈“老陈”怎样一回山西就到昔阳，谈老陈家的事。他给儿子陈明珠找了个很朴素的媳妇，陈

明珠不要，要漂亮的。又谈到他们关于大寨的宣传计划。关于这，老陈说了：“是你当副总理还是我当副总理？”显然这计划是宋莎荫提的。

计划不是区区一本书了，是一套丛书，有大寨史、大寨英雄列传、昔阳学大寨典型录、昔阳的英雄人物在山西各县……当时我不知怎样去完成这一大套任务，而他说：“这是跟老陈商量好的，就要这样成套。你们可以各处采访，我们的作者也要出去跑。”这时，这群年轻“作者”也已经在宾馆里出出进进，看样子已经脱产写作了。我无法可想，只有含糊点头，说以后再详议。

就在这以后不久，我最后一次来大寨，原因是大寨那批年轻作家的短篇稿子，陆续交卷。经我们的编辑看过，实在无法出版，这下惹起了陈明珠在全国有关出版会议上愤怒的抗议，原来负责答应出这本书的编辑组长也不答应。而编辑人员们跟这本书打了多次交道，谁也不愿再去昔阳了。没办法，只好由我出马，带上一个从未去过昔阳的编辑杨匡满，另外还有我们出版社去编诗的、编舞的，也都在昔阳。

这次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，人家的接待也十分隆重，让我们住进了新建成的“大寨宾馆”。尤其使我受宠若惊的，因为宾馆宾客如云，高级房间不够分配，竟蒙宋莎荫特批，让我住进了这里为陈永贵特留的房间——陈副总理的别墅。引起我们社一群编辑都进来参观，说：“这次你可受到了‘国宾’待遇了。”但是，陈副总理这间行宫究竟如何？按其设备，不过一个普通宾馆的带套间房间，尤其使人想不到的，是室内那些铺在茶几上的、垫在高脚花盆几上的台布，不但不是桃花网扣之类的纱巾，连普通塑料布也不是，而是农村小女孩常穿的红地绿花点子花布！不仅如此也，还好像怕台布滑下去，还在每个桌子角都用针线缝成个角角（也许是为了不必换洗？）。台布变成未完工的枕套，这个设备实在新奇。当然，这实在太土气，土气到任何旅馆也不会这么办。我当时就想了，这除了陈永贵，别人谁也不会搞这个摆设。这点事大概宋莎荫没有管。在这里，陈永贵才让我们看了看他自己。

然后就该我们分头下去“采风”了。诗歌组要搞一本《昔阳新歌谣》。这本最容易，那时候村干部无人不会凑两句合辙押韵的，随便抄抄就是一本。编舞的那一本就相当困难。是什么民间歌舞要在昔阳会演，要专出一本昔阳创作的歌舞集。这时候，音乐出版社已经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，我虽然管不着人家的工作，却也算挂名。我就跟她们下去观光了一次“采风”。地点是昔阳某村一个小学校，演员就是小学大约四五年级的女学生，内容是我们小时候谁都学过的表演唱。农村女孩对歌舞大约很难有机会接触，动作非常迟钝，配不上曲调，那位老编辑简直用尽平生之力，像给大乐团，名舞蹈家记录作品一样，记曲谱，画舞步。（后来还为了要出这么一本书太麻烦，出版部说来不及，干不了。我不

得不帮着音乐编辑室，要一切让路，把这本大寨任务书硬安排了进去，抢印出来。)

我个人的采风任务，是按照那些年轻“作家”作品中所列，挨村拜访这些模范村。

那是一九七五年，我和编辑杨匡满两人坐个小吉普车，到每村之后，都是跋山涉水，尽力实地参观。但是可惜现在叫我怎么想那些村的特点，除了拼死挖土这一条之外，再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挖掉了一个土岗，挖通了一条渠……都差不多。只记得各村都向我们介绍，他们村原来的支部书记现在都在邻县当县委书记去了。模范的经验要推广嘛。所以现在昔阳附近各县已经全由昔阳人做主包了。听了这话，我不由得想到，这好像殖民地政策，再过几年，昔阳的干部不愁出路，一个个出去走马上任吧——但是，当然不能光这样挖苦人家，不看见他们真正受的苦。有一个现任支部书记，在介绍完情况之后，曾偷偷地对我说过一句：“别的没有什么，就是这两年干部的牺牲，提起来有点惨人。不管发大水出沼气，不管什么要人命的事，支部书记都得把心一横，头一个跳进去。死的是真不少！”他也算是提着脑袋在干的，我不得不为之默然。

参观学习任务完成以后，回到北京，那本书得出啊。别的过去跑过昔阳的编辑都冷眼看着新责任编辑杨匡满，他既没有成见，看他怎样编这本书。等他看完了，他即把稿子往我办公桌上一搁，说：“这怎么能出啊？是中学生的不高明的作文嘛！”我苦笑了，说：“我早知道是这样，哪用得着细看？你去瞧着办，凑合事吧。”于是他把稿子拿回。在出版部的书稿印数、发行范围单子上，有书稿质量一栏，一般编辑对于看中的稿子，总是填个“优秀”，勉强一点的，填个“中常”，杨匡满却在这一栏填上了“很差”两字。这是从来没有的。我也只得把心一横，当没看见，签上字发了出去。那些舞蹈诗歌的书自然也都由各书的主管副总编辑签字发出了。

但是这时我下了决心，这一次就凑合了，以后的《大寨丛书》可不敢再奉陪。慢慢拖着办，走着瞧吧。我再也不想上昔阳去了。那个“国宾”别墅也不想住了。

很快就到了一九七六年一月，周总理去世的消息，使人们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悲哀，后来又加上深沉的愤怒。正在这时，我社的上级单位忽然来了通知，叫我们去参加大寨学习参观团，去人越多越好。许多人对于这次活动都不想理睬。后来拉了一些人去了，他们大概本来以为周总理去世引起的波澜，很快就能过去，所以循例参观了一通，就回来了。谁知天安门的写诗和吊唁，这时正到高潮。全社的人，大都在禁令之下偷偷跑去。天安门成了人们的心倾向的中心。上级单位便又发通知，大寨参观学习团要做详细的传达报告，占工作

时间，叫全体同志去听。结果礼堂的位子大部分空着，人们不去。于是又上楼来叫，还是没有几个去的。我安坐不动。有一位来“掺沙子”的军代表（就是身穿军服，跑到我们这些文化单位来当领导的军人，号称“沙子”。见毛主席关于林彪指示的文件），他用手指着我说：“身为党员，连党的号召都不响应，连大寨都不去学习！”我的愤怒已经塞满胸膛，还说什么，这时我只淡笑了一下，说了一句：“我去过五次大寨了比一趟参观知道得多！”还有几个不去的党员，一言不发，怒目而视，他才没意思地走了。

大寨，竟变成了反对周总理，抵制群众的一块招牌。在这种状况下，使人们听见大寨就当然齿冷。这怪谁？

我想：陈永贵原来大概是一个很好的朴素的农民，诚恳地想做好工作的农村干部。但是并不是一个农业科学家，不是一个宣传家，更不是一个政治家。硬要他去当，结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。至于对他本人，则简直造成了一场悲剧。

至于借有利于己的机会登台出乖露丑的角色，那是无论什么年代都会有的。就如宋莎荫那样，不足深责。谁叫你听信他的出谋划策来？

更应该惭愧、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，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，点头赞扬，闭眼不管，还签字……这是干的什么？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？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？我只希望在自己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，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，不再帮这种腔，不再点这种头，想想古人，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这一条。

（选自1988年第2期《山西文学》）

丙午丁未纪事

——乌云与金边

杨 绛

丙午、丁未年的大事是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”。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不是“革命”的主要对象，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名位也从不掌权的人。一般只不过陪着挨斗罢了。这里所记的是一个“陪斗者”的经历，仅仅是这场“大革命”里的小小一个侧面。

一、风狂雨骤

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——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，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：“我今天‘揪出来了’，你呢？”

他说：“还没有，快了吧？”

果然三天后他也“揪出来了”。

我问默存：“你是怎么‘揪出来’的？”

他也莫名其妙。“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。”

我倒记得很清楚。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，不过我已早知不妙。一次，大会前群众传着一份文件，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，好像没有我这个人。再一次大会上，忽有人提出“杨季康，她是什么人？”，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，因为正在检讨另一“老先生”。会后，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：“以后开会，你不用参加了。”我就这样给“揪出来了”。

“揪出来”的算什么东西呢，还“妾身未分明”。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，我们同组“揪出来”的一伙，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。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“语录”条，有一张上说：拿枪的敌人消灭后，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。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。他好像阿Q照见了自已癞痢头上的疮

疤，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座位。好在屋里空位子多得是，我们足有自由随便就坐，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。

有一天，报上发表了《五一六通知》。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，窃窃私议，忽被召去开大会。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，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。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：一、不发工资，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；二、每天上班后，身上挂牌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；三、组成劳动队，行动听指挥，并由“监督小组”监管。

我回家问默存：“你们怎么样？”当然，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，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。他的专职是扫院子，我的专职是扫女厕。我们草草吃过晚饭，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，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。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，白底黑字。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，黑底白字。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，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，两人各按规定，精工巧制；做好了牌子，恭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，然后穿上绳子，各自挂在胸前，互相鉴赏。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，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：“curiouser and curiouser!”

事情真是愈出愈奇。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，只有一个大席棚。有一天大雨骤冷，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，把各所“揪出来”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，押上台去“示众”，还给我们都戴上了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。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，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“示众”的都是“牛鬼蛇神”。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，如“黑帮”“国民党特务”“苏修特务”“反动学术权威”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等等。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散会我给推推搡搡赶下台，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。我原来是个“资产阶级学者”，自幸级别不高。尖顶高帽都需缴还。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，我就升级成了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，和默存一样。

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，只愁淋成落汤鸡，不料从此成了“落水狗”，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，称为“揪斗”。有一天默存回家，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，现出一个“十”字；这就是所谓“怪头”。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，赶紧把他的“学士头”改为“和尚头”，抹掉了那个“十”字。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“怪头”，饱受折磨。理发店不但为他理发，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，命他戴着回家。

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，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。有一晚，同宿舍的“牛鬼蛇神”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，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。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、鼻涕和糨糊，渗透了薄薄的夏衣。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。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，排成一队，大家伛着腰，后人扶住前人的背，绕着

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；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。发号施令的是一个“极左大娘”——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；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。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，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。等我们能直起身子，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，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。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，只好赤脚上楼回家。

那位“极左大娘”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：“你们这种人！当心！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！大楼我们来住！”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，不时发出警告：“×门×号！谁在撕纸？”“×门×号！谁在烧东西？”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，“谁家烟筒冒烟呢！”夜渐深，她还不睡，却老在喝问：“×门×号！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？”

第二天清晨，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。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。我去扫地的几处，一般都很体谅。有的说，院子已经扫过了，有的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。有一家的大娘却狠，口口声声骂“你们这种人”，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，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。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做鞭子，抽得我肩背上辣辣作痛。我认识她。我回头说：“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。”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。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：“他和你们不一样！”随手就猛抽一鞭。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，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。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。

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。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“牛鬼蛇神”去训话，下令每天清上班之前，扫大院，清除垃圾，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：不许喝牛奶，不许吃鱼、吃肉、吃鸡蛋，只许吃窝窝头、咸菜和土豆。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，也不知是谁制定的，如不准戴草帽，不准撑阳伞，不准穿皮鞋，等等。我们这群“牛鬼蛇神”是最驯良、最和顺的罪犯，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。因为一经“揪出”，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，而在人民群众之外，如果抗不受命，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，“自绝于人民”。“牛鬼蛇神”互相劝勉、互相安慰的“官话”是“相信党，相信人民”。虽然在那个时候，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，人民又是谁。

“极左大娘”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，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。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，因为家有阿姨，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门进来搜查。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的红卫兵拿走了，又要拿打字机。阿姨撒谎说是公家的，没让拿。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关不准我家请阿姨，“极左大娘”只好放她走，我才关住了大门。阿姨临走对我说：“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——不过，还是好人多。”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，她是吃过苦的人。我常想：好人多吗？多的是什

么样的好人呢？——“究竟还是坏人少”，这样说倒是不错的。

“扫地出门”很多地方实行了，至少，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。家家都有。“罪证”得销毁。宿舍里有个“牛鬼蛇神”撕了好多信，不敢烧，扔在抽水马桶里，不料冲到底层，把马桶堵塞了。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“权威”，他不敢麻痹大意，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，敬献革命群众。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“揪斗”。我回家较晚，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，大院里也挤满了人，有坐的，有站的。王大嫂是花儿匠的爱人，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。我心知不妙，却又无处可走，正迟疑，看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，示意叫我退出去。可是“极左大娘”已经看见我了，提着名字喝住，我只好走上台阶，站在默存旁边。

我们都是陪斗。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，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，剃成“阴阳头”。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，也在我们队里。她含泪合掌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，总算幸免剃头。我不愿长他人志气，求那姑娘开恩，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。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。

剃了“阴阳头”的，一个是退休干部，她可以躲在家里；另一个是中学校长，向来穿干部服，戴干部帽，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。我没有帽子，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，却又不能躲在家里。默存急得直说“怎么办？”我持强说：“兵来将挡，火来水挡。总有办法。”我从二楼上三楼的时候，果然灵机一动，想出个办法来。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，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。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椗子，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，解开辫子，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。我想不出别的方法，也没有工具，连糨糊胶水都没有。我费了足足一夜功夫，做成一顶假发，害默存整夜没睡稳（因为他不会帮我，我不要他白陪着）。

我笑说，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，洗脸可以连带洗头，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。果然，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，只是变了样。我自持有了假发，“阴阳头”也无妨。可是一戴上假发，方知天生毛发之妙，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，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，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，简直难以忍耐。而且光头戴上假发，显然有一道界线。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，已由乌黑变成橘黄色，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——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。

来京串联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，公共车辆拥挤不堪，上车不易。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头挤车。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，进不去，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，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，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，对我大喝一声：“哼！你这黑帮！你也上车？”我声明自己不是